

何俊编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余英时 著
李 彤 译

33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

何 俊 编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余英时 著
李 彤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余英时著;何俊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2005.7重印)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丛书;4)

ISBN 7-5325-3820-6

I.十... II.①余...②何... III.史学-中国-文集 IV.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709 号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余英时 著

何俊 编

李彤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5 $\frac{14}{18}$ 插页 5 字数 88,000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101—4,600

ISBN 7-5325-3820-6

K·611 定价: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813

编者序言

何 俊

我收集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著,初衷本是为了自己更全面地学习他的治学方法和理解他的论学旨趣。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觉得,如果能将这些论著译成中文,也许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一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更全面地读到余先生的论著;二是有助于对海外汉学以及中美学术交流的认识与研究。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编为四册。《东汉生死观》取名于余先生1962年在哈佛大学的同名博士论文。由于这篇学位论文中的第一章后经修改以同名发表于1964—1965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因此在本册中用后者取代了前者。此外,另收了同一主题的一篇书评(1981年)和一篇论文(1987年)。时隔二十年作者续论这一主题,主要是因为考古的新发现。1978年末余先生率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月余,汉代文献与遗迹的亲切感受大概也起了激活作用。

《汉代贸易与扩张》取名于余先生1967年出版的同名专著。此外,另收了两篇论文和一篇书评。论文与汉代有关,发表的时间虽然分别是1977年和1990年,但后者是因所收入的文集出版延后所致,实际上它们同时完成于1973—1975年间。与这一主题相关,作者后来为《剑桥中国史》(秦汉卷)(1988年)撰有专章“汉代对外关系”,此书早有中

译本,故这里不再收录。1964年刊行的书评是关于唐代财政体制的,虽与汉代无直接关系,但考虑到主题同属于社会经济史,所以一并编入此册。

《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由多篇论文组成,讨论主题集中在中国思想史,涉及3世纪到当代,体裁有专论、书评、条目和序跋,先后发表于1980—2000年。之所以取名为《人文与理性的中国》,是我以为这个提法能反映余先生的思想,他的所有思想史论著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也正是要释证中国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和理性精神。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取名于余先生作为美国汉代研究访华团团长写成的同名总结报告。此外,收入了由余先生汇总的访问活动与讨论日记,以及差不多同时完成并与主题相关的一篇专论。这篇专论最初以中文写成发表,后被译成英文并经作者适当改写后发表,收入本册时相同部分照录中文,不同部分则据英文而译。

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著在1970年代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此后他的学术论著主要是以中文发表,大部分英文论著则概述他中文论著的主要思想,以及他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分析性通论。前者显然是因为他希望更直接地贡献于中国学术,后者则表明他希望将中国的学术引入美国。促成这个变化的契机大概是他1973—1975年在新亚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任职。虽然服务两年后仍回哈佛任教本是事先的约定,且这两年的服务也令他身心疲累,但深藏于他心中的中国感情似乎更被触动,更需要得到合理的安顿。1976年1月余英时先生四十六岁时,同在哈佛任教的杨联陞将自己与胡适的长年往来书信复印本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在封面上题写:“何必家园柳?灼然狮子儿!”大概正是体会到弟子的心情而示以老师的宽慰、提示与勉励吧。

此后,余先生与两岸三地的中国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我在余先生小书斋的书架上翻览时曾见到钱锺书在所赠《管锥编》扉页上的题词,当时觉得有趣,便请余先生用他的小复印机复印了一份给我,现不妨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一个佐证。题云:

误字颇多,未能尽校改,印就后自读一过,已觉须补订者二三十处。学无止而知无涯,炳烛见跋,求全自苦,真痴顽老子也。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并告以入语林。

总之,读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著应当注意其中的中国学术背景,正如读他的中文论著应该留心其中的西方学术背景一样。

借此我说几句言轻意重的感谢话。感谢余先生对我的信任,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张晓敏先生、编辑童力军先生对我的支持,感谢所有的译者对我的帮助,以及对我校改大家译文的理解。还要预先感谢读者对这一汉译集的宽容,因为我认识到翻译的不容易,尤其是翻译汉语文章写得极好且广为人读的余先生的英文论著,所以我常想像到嚼饭与人的感觉。因此除了预先感谢读者的宽容外,我也诚望读者能够得意忘言,尽管不足甚至错误的责任我丝毫不应该也不可能推卸。

最后我想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神学组主任卢龙光教授,他邀我来此任客座教授,使我在教课之余有自由的时间来集中处理这一汉译集的工作,同时也让我得以利用这里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来复核相关文献。还有,我窗外的溪声鸟语、绿树红花,使我孤寂的工作变得活泼泼地。

2004年4月8日

序于香港中文大学神学楼

目 录

编者序言	何 俊 1
1.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1981 年)	1
1.1 反“影射史学”运动	1
1.2 “破除禁区”	5
1.3 与历史学家的私人交谈	8
1.4 个人的一些观察	12
2. 活动与讨论日记(1981 年)	18
10 月 15 日,星期日,成田	18
10 月 16 日,星期一,成田—北京	18
10 月 17 日,星期二,北京	19
10 月 18 日,星期三,北京	21
10 月 19 日,星期四,北京	31
10 月 20 日,星期五,北京	34
10 月 21 日,星期六,洛阳	36
10 月 22 日,星期日,洛阳	40
10 月 23 日,星期一,西安	42
10 月 24 日,星期二,西安	46
10 月 25 日,星期三,西安	50
10 月 26 日,星期四,西安	51

10月27日,星期五,去敦煌的途中	52
10月28日,星期六,去敦煌的途中和在敦煌	52
10月29日,星期日,敦煌	54
10月30日,星期一,回兰州途中	58
10月31日,星期二,兰州	58
11月1日,星期三,兰州	59
11月2日,星期四,兰州	61
11月3日,星期五,兰州至长沙	61
11月4日,星期六,长沙	62
11月5日,星期日,长沙至昆明	63
11月6日,星期一,昆明	64
11月7日,星期二,昆明至成都	65
11月8日,星期三,成都	66
11月9日,星期四,去灌县参观	69
11月10日,星期五,成都至北京	71
11月11—17日,北京	71
编者附注:关于汉代研究访华团及其报告的说明	73
3. 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1982年)	76
3.1 史学中的客观与主观	77
3.2 “历史规律”与时代需要	80
3.3 基于西方经验的模式	83
3.4 超越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实证主义限制	85
3.5 中国史学家理解的“方法”	88
3.6 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	90
3.7 史学研究中的比较与比附	92
3.8 中国史学的“中距程”进路	95

1.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1981 年)

在我们代表团访问期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一场统称为“思想解放”的变革,它的正式名称是“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少对中国而言,在我们所访问的各个地方,尤其是在北京,思想界的气氛应该是异常宽松。我无拘无束地和中国学者谈到胡适、钱穆以及其他海外学术界的人物,没有感到对方有任何的不自在或尴尬。我也有机会和一些中学生聊天,他们提出了自己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和伟大舵手的批评意见。这令人想起 1978 年 11 月中旬爆发的民主墙运动,它刚好发生在我们离开中国后。回想起来,正值中国步入正确轨道之时,我们访问了这个伟大的国家,这的确是很幸运的。

当然,此次访问的官方性质决定了我们很难深入到中国历史学家的内心世界。而且,因为代表团的重要任务是考察秦汉考古原址,碰到的自然更多的是考古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下文中我将根据“四人帮”倒台后的出版物,以及与中国学者的单独谈话内容,试就近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动向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1.1 反“影射史学”运动

1976 年“四人帮”倒台后,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中国历史中的儒法斗争”的主旋律遭到摒弃,而且对孔

子的批判也降了调。有几次在预料到我会持否定意见的情况下,他们还特地邀请我去评论儒法斗争。如同我们的中国同行现在看到的,在“四人帮”控制下(特别是从1973年到1976年),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已完全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帮”的“那伙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并无兴趣,他们是用历史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孔子先是与周恩来挂钩,接着是邓小平,最后是华国锋。秦始皇与毛泽东,汉代的吕后和唐代的武则天与江青,法家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儒家与部分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划上了等号。因此,“影射史学”一词被用来描述“四人帮”直接影响下所出版的“历史”著作的特征。

反“影射史学”运动几乎在“四人帮”垮台后就立即开始了。据我所知,“影射”一词最早见于1976年10月份那期《历史研究》。自从“文革”后期复刊以来,《历史研究》一直受那伙人牢牢控制。这份专业刊物呈现出非常严重的症状,大多数文章采用影射方式。正如一篇简要评论所批评的:“(那伙人)借古讽今,影射比附,弄虚作假,断章取义。”^① 在我们访问中国时,这场运动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从私人交谈中,我得知“四人帮”在北京、上海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写作班子,分别以梁效(与“两校”谐音)和罗思鼎(与“螺丝钉”谐音)为名发表文章。有些人对滥用影射史学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其中,杨荣国、赵纪彬、周一良、刘大杰尤值关注。

最近一位中国作者披露,“儒法战线的斗争”这一论题最初是由杨荣国提出的,1972年底杨在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了题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从此这个论题被极度引申,以至于“文革”被解释为儒法斗争的延续。^② 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初学集》等早期著作的质量看,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三流的普及

① 见《历史研究》1976年第5期页27评论员文章。丁伟志《“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页5)一文认为,华国锋将“四人帮”对历史的态度视为“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

② 见华森《帮用史学的始作俑篇》,《学术研究》1978年第2期,页18—23。

者和综合者。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在钻研原著的基础上,从事过专题性研究。1973年他突然近乎神话似的成了国内(乃至国际)中国史方面最富权威性的人物。在“四人帮”时期,由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975年修订版)比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而且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安徽、北京等许多地方邀请他去群众大会上作反孔演讲。^①然而,公允地说,杨后来的一些观点可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渊源。例如,春秋时期“礼”、“法”斗争的问题,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和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提法,都出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唯一的区别是早期这些论题没有因服务于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到极点,可能因为他强烈反孔和赞成法家,所以“四人帮”选他充当官方史学家。据可靠消息说,他死于1978年,那时他已名声扫地。

赵纪彬与杨荣国不同,他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在反孔运动中,他尤以他的“发现”出名。他发现了历史上儒法路线斗争的最早证据——孔子在公元前498年杀了少正卯。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专题论文中,他试图大胆地证实最初出现于《荀子·宥坐》中的这个故事。通过多种形式的文献学歪曲和对原文的曲解,他声称已确证“史实”:孔子任鲁国司寇时,处死了少正卯,而少正卯是“法家先驱”。还有意思的是,在讨论此问题的众多作者中,赵称赞杨荣国最接近问题的真相。^②最近曝光了一些内幕,据说在反孔运动早期,江青和姚文元觉得需要找一个反孔的法家人物,以便全面展开从孔子时代到现代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论题。法家直到战国才出现,时间太晚,无法适应政治需要。赵对少正卯问题的研究恰好填补了“四人帮”政治空论上的缺口。^③出于同样目的,1974年赵还修改了他的《论语新探》。正如他在

① 见诸葛计和方式光《且看庐山真面目》,《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页17—25。

② 赵纪彬《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页8—9;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香港:三联书店,1952年),页86—87。

③ 傅孙《评唐晓文的三篇代表作》,《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页48—49。

修订本的后记中所讲,他抛弃了较早的看法。以前他认为孔子思想中有“进步”一面,也有“反动”一面。后来他得出结论,孔子思想完全是反动的,所有方面都趋向于“复辟”。^① 这里,政治上的暗示和赵的评论中与现代的关联,都太明显了,不会被忽略。然而,由于赵的著作总是采用语言和原文分析的形式,所以可能从未得以流行。幸运的是(现在看来是不幸),他在“四人帮”团伙的青年人中发现了一个叫唐晓文的有力普及者。基于赵的“学术发现”,唐写了许多争鸣文章,借孔子攻击周恩来。例如,他对赵《论语新探》里的一个章节作通俗翻版的文章《孔子是全体人民的教育家?》,显然是把周的教育方针当作活生生的靶子。赵也是由唐于1973年6月引荐给江青的。^②

周一良是哈佛培养的史学家,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他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5年卷八上发表的《中国密教》(“Tantrism i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8, 1945)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充分显示了他渊博的学识。我早已得知他投靠了“四人帮”,但直到来中国,才知道他卷入“四人帮”政治中有多深。他是最受江青信赖的主要学术顾问之一和“四人帮”在北京的写作班子(即臭名昭著的梁效)里的重要成员。1974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诸葛亮的法家路线,另一篇关于柳宗元的《封建论》。^③ 据最近一位作者说,后一篇尤受江青赏识,因为文章正好包含了针对军区司令的信息,即他们必须服从“四人帮”的集中控制。^④ 对诸葛亮的研究也是为“四人帮”的政治需要服务的,他得出的“教训”是:一群人只要遵循“法家路线”,就可以很快创建一个统一帝国,而他指的“法家路线”就是“四人帮”的“革命路线”。^⑤ 显然,在质而不是在量上,周的文章为

① 赵纪彬《论语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418—419。

② 傅孙《评唐晓文的三篇代表作》,页54。

③ 周一良《诸葛亮和法家路线》(《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页57—66)和《读柳宗元封建论》(《红旗》1974年第2期,页32—39)。

④ 见陈石之《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页7。

⑤ 见田居俭《助帮为虐的诸葛亮研究》,《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页11—19。

“影射史学”的兴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①

刘大杰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文革”以前,他一直是受人尊敬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因为借武则天颂扬江青,他犯了影射的错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二册是以儒法斗争的观点来系统阐释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第二章第二节则全部留给了武则天时代。很大程度上,作者将初唐的文学成就归功于女皇的法家政策,并且在唐代文学史上为她保留了极高的位置。在论述古文运动的第七章里,作者希望采用的理论框架是,“进步的法家”柳宗元(773—819)是运动最重要的领袖,而“保守的儒家”韩愈(768—824)只能被排斥在外。然而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作者采取歪曲事实的手段,企图证明柳宗元在一些政论文中声讨过周公。在这种情况下,周公无误地是指周恩来。最近,刘大杰的著作作为“影射史学”的典型而受到严厉批判。^②

反“影射史学”的运动大概要占用中国学者几年时间和精力。为了在中国史领域中开始新的耕耘,必须首先清除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的影响既深且广。在过去的三年里,关于孔子、荀子、秦始皇、董仲舒、武则天、柳宗元、韩愈、王安石、苏轼、宋江、王夫之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换言之,中国学者用大量时间只是为了清除“四人帮”时期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

1.2 “破除禁区”

当我们到达北京时,一个全国性的史学会议刚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这是我们所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新动向。会上

^① 见丁伟志《“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页5)和徐中玉《从“四人帮”反苏轼谈起》(《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7月第7期,页25—26)。

^② 吴文祺《一本荒谬的文学史》(《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10月第7期,页229—242)和唐振常《可怜无补费精神》(同上,页243—271)。

重新讨论了中国古代的分期问题。在 10 月 18 日的午餐会上,我们的主人于光远先生告诉我们会上提出了六种不同的分期理论。我们知道分期问题本身并不新鲜,它在五十年代就曾引起争论的话题。^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取决于奴隶制结束和封建制开始的年代。郭沫若的分期被采用为正统的解释。他认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帮”认可郭的观点,并非因其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非常符合他们对孔子的解释,他们认为孔子是行将崩溃的奴隶制的捍卫者。在“四人帮”猖獗的时候,不允许其他理论的存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也因此成为“禁区”之一。

11 月初,当我们回到北京时,《光明日报》(1978 年 11 月 18 日)简要地报道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由《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战线》两个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 15 个省市的 86 位史学家代表 51 个教学、科研、出版单位参加了会议。^② 六种分期理论是:

1. 西周。这个理论为已故范文澜所坚持。此论主要建立在两个论据上:其一,在各种周代文献和青铜铭文中,民、庶民或庶人指的不是奴隶而是平民,包括拥有土地和农具一类私有财产的农民。其二,井田制下各级地主私田分配给农民耕种,这种土地制暗示着封建主义。

2. 春秋时期。郭沫若最早提出此理论,但后来放弃了。他认为转型发生在公元前 770 年左右,分封制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特征。新的土地和税收制度(诸如公元前 645 年晋国的“爰田”,公元前 594 年鲁国的“初税亩”和公元前 590 年从每丘征兵),以及铁农具的出现也被作为封建制开始的证据。

3. 战国时期。这是郭沫若最后提出的决定性意见,可能这一理论在当今的史学家中拥有更多的支持者。战国时期,铁农具不仅出现了,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见 Cho-yun Hsu, "Early Chinese History: The State of the Fiel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8, 卷 3 (1979 年 5 月), 特别是页 454—456。

^② 关于此次会议更进一步的报道,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4 期,页 123—130。

而且在北至长城南到长江流域的区域里得到广泛使用,这被视作封建生产方式的主要成分而得以强调。其他的技术进步,如使用畜力耕地、修建灌溉工程和施肥,也认为很重要。以这种观点看来,井田制有些像奴隶制的土地制度,战国时期废除井田制意味着封建制的开始。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转变清楚地反映在官僚政治的改革中。从公元前 426 年(魏)到公元前 316 年(燕),各个诸侯国里都发生了变革。这个理论的一个变体,是将公元前 350 年商君正式废除井田制看成是奴隶时代结束的标志。

4. 秦的统一。据此理论,中国的奴隶时代始于夏代,西周时期达到顶峰,结束于秦的统一,整个战国时代是过渡时期。在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出现、官僚政治的改革运动和井田制的瓦解,导致了公元前 221 年中国完全的封建化。金景芳是这个理论的主要提倡者。^①

5. 东汉时期。这一派对西汉社会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西汉时期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这是史无前例大规模掠夺奴隶的结果。另一种注意到相对于有权有势的奴隶主家庭,农民也有少量地产。但他们坚持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方面,奴隶制继续占统治地位。总的来说,这一派非常重视东汉光武帝颁布的解放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构成了中国封建国家的法律基础。

6. 魏晋时期。最后这一派也相信,在汉代政府和私人的大型农工商企业中,奴隶是最主要的劳力。这一派的领袖何兹全主张汉代以后奴隶制才向封建制转化的观点,他分析了魏晋时期的四类社会经济变化:一、城市向自然经济的转移;二、介于奴隶和平民之间的半自由社会群体(如客和部曲)的出现;三、政府和豪族之间竞相控制人口的争斗;四、无土地农民的社会身份由游民向农奴转变。^②但在转变的确切时间上,这一派出现了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是在三国鼎立开始时,另一

^① 见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页48—57;第3期,页50—63。

^② 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页87—96。

些人(包括何兹全)则对比西方的罗马帝国,认为封建制度伴随着西晋的灭亡而产生。

正如中国报导所评论的,会议的重要性不完全在于提出了各种理论的根据,因为大部分讨论是1950年代的继续。在大约中断十二年之后,中国的史学家们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可以第一次发表不同的看法,这是这次会议的意义所在。^①这一禁区的突破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势必产生重要的影响。譬如当我和一位成都的学者讨论这次会议的意义时,他说:“假如中国的封建制并不像过去十年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始于战国时代,而是始于西周,那么所有关于儒法斗争的讨论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事,而且将不得不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孔子和他的思想。或者如果我们接受产生于东汉或魏晋的假设,那么我们对秦始皇及其政策的成见可能发生戏剧性的改变。”由此我们看到,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随着分期问题的公开化,“影射史学”的基础开始坍塌。^②

1.3 与历史学家的私人交谈

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我个人只有很少时间和精力拜访史学家。不过幸运的是,我还是有机会与一些杰出的史学家进行了私人交谈。

首先是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是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专家。他研究中国佛教的文集《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初版于1963年。^③任先生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时,师从汤用彤和熊十力。因为我多少了解一点熊的著作,所以我们便从熊的哲学影响,特别是熊的两位高足唐君毅和牟宗三在港台领导的新儒学运动谈起。从当代新儒家,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宋明理学。在一起简单回顾了西方、港台和日本的理学研究,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研究的近况后,我问任先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页129—130。

^② 见刘泽华《砸碎枷锁解放史学》,《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特别是页17—18。

^③ 这本书的修订本名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生,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们是否会对理学感兴趣。我强调,理学的传统在思考的范畴(categories of thinking)方面,而不是思想的内容(substance of thought)上,其学术力量(intellectual force)远没有丧失。为了说明这点,我向他提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一般说来,儒家思想家,特别是理学家,对改造世界要比解释世界总是抱有更多的兴趣。这与马克思所见到的西方哲学传统几乎完全相反。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那么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相信这是主要的奥秘之一。其次,现代中国人非常强调“专”与“红”的区别,这在理学“道问学”(朱熹)与“尊德性”(陆王学派)的区分中可以找到很深的根源。我希望中国学者能更严肃地对待理学,而不是仅仅在政治上指责它。任先生显然能接受我的非正统观点,虽然他很可能只是出于礼貌。不管怎么说,他让我相信他有编辑理学原著的计划。他特别提到,在这个计划中,王阳明的著作可能在不久后能出版。

在成都,我有机会与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交谈。我求见缪教授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而且因为他是我以前的老师钱穆教授的老友和杨联陞教授的内兄。和钱穆一样,缪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精通古籍、历史和文学。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他主讲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的历史。他的著作很多,其中《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收集了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杜牧传》(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的初稿实际完成于1964年。他对杜牧(803—853)这位盛唐诗人做过详细的编年研究,写成了《杜牧年谱》,此书正待出版。

缪将近八十岁,尽管患有白内障,但“四人帮”倒台后,他恢复了活力,坚持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交谈中,我了解到整个“文革”期间没有学者能够进行任何严肃的研究工作。譬如,虽然教授们全都不教学了,但仍要求参加日常的政治会议,学习“革命文件”。有时甚至要过半夜才回家,实已筋疲力尽。后来我在北京时,从瞿同祖教授那里印证了这一点。瞿教授是“文革”前夕回国的,我问他回国后从事哪项研究,他说几个月前才调入近代史研